



苏东坡画像

# 苏东坡“三宝”妙解海南长夏

■ 吴辰



天气确是越来越热了。当人们吹着空调、吃着冷饮尚且还抱怨要热到融化的时候,想想古代那些人,不知在苦夏里如何艰难度日。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古代人担忧,一来是古代天气未必有当今这么热,二来是古代人自有古代人消夏的方法,轻罗小扇、冰鉴玉枕等器物都不在话下,甚至连冰粥、凉茶也是早已有之。虽然是没有空调,但谁能笃定古代人的夏天过得就不如我们现在惬意呢?

海南自古以来都以炎热著称,《正德琼台志》在记录海南气候的时候写到“地居炎方,多热少寒”,生活在里面的古代人面对漫长的夏日,则是各显神通,自有其一套办法,而苏东坡更是其中魁首,想出了各种方法来让自己适应这炎炎夏日。



白釉绿彩贴塑鱼纹吸杯(唐)。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大宋哲宗年间,已是花甲之年的苏东坡一路南迁,直至海南,渡海之前,他甚至已经写好了“遗书”,称“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伯之义。”苏轼此番赴琼,心情已是坏到了极点,而其渡海之日又恰逢六月,诚如《儋县志》所言:“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及至登岛,苏轼称自己已经是“瘴疠交攻”了。不过苏东坡到底是一个乐天派,刚到海南,他就在这郁热中品出了一丝清凉,他写道:“岭南天气

## A 心静自然凉

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绝也。乃至寿天不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苏东坡毕竟是个六十岁的老人,在宋朝,人到了这个年龄是该想想死生之事了,本以为到了儋州此身必将速朽,却看到此间老人成群,百岁者大有人在,静言思之,自己方才花甲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流金之暑”对想明白了的苏东坡来说也算不得什么了。

渐渐地,苏东坡也发现海南

夏天的好处,《正德琼台志》中有记载称苏东坡在海南时曾经称这里“夏无蚊蝇,可喜”。在绝境中看到生机,在困苦中保持乐观,这正是苏东坡的过人之处,苏东坡口中所谓的“蚊蝇”恐怕也不仅仅是真实存在的蚊蝇,而更多指的是那些扰人心神的世间俗事,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在这天涯海角都变得一文不值。虽然天气还是一样的酷热,苏东坡却因为逃避了功名利禄的网罗而为自己的内心找寻到了一丝清凉,再加上从海南百岁老人那里学来的豁达和洒脱,“心静自然凉”这句话对苏东坡而言绝非虚妄。难怪在离开海南的时候,苏东坡要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了。

## B 不离不弃荷叶杯

除了“心静”之外,苏东坡解暑还有另一件法宝,他在一首诗的引言中写道:“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独有一荷叶杯,工制美妙,留以自娱。”苏东坡的荷叶杯自然不是真荷叶所做,但是以荷叶为酒杯之形,其取的却正是“清凉”之意。

《清稗类钞》中对荷叶杯有详细的记载:“吸杯,作莲蓬、莲叶交互相连状,别有莲茎,茎之中有孔,可吸饮。”而追溯荷叶杯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到了唐代,荷叶杯就早已十分普及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济南人喝

酒的场景,称:“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憲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筭杯。历下教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更有甚者,用这种荷叶杯来比赛喝酒,“暑月临水,以荷为杯,满酌密系,持近人口,以簪刺之,不尽则重饮。”看来,这荷叶杯本就是属于夏日的风雅。苏东坡本是喜好聚宴的人,对于此类玩物,自然不能错过,他曾经与其他四位友人泛舟城南,饮酒作诗,酒器就用的是荷叶杯,而在诗中也写到了用此杯盛酒的特点:“碧筭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

## C 苏过发明的“玉糁羹”

有人说苏东坡在海南时曾经吃过椰奶清补凉,并作诗对其大加赞美,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作为美食家的苏东坡与清补凉也许还真的有着不解之缘,在儋州谪居时,其子苏过所发明的“玉糁羹”还真的有几分类似清补凉。

宋朝的海南生产力比较低下,吃米吃面都需要北船从别处运来,有时候赶上台风季,十天半月吃不上米面都是正常。于是,当地人常吃的薯蓣便成为苏东坡及其家人常吃的主食,而薯蓣质地粗糙且淡而少味,现今多归其为“杂粮”一属,美食家苏东坡是不甚爱吃的,而其子苏过却将其加工成了“玉糁羹”,颇得苏东坡喜爱,还为此作了一首诗,诗云:“香似龙涎仍醒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此诗题为《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将这一食物吹捧的天上少有、地上绝无。仔细想想,所谓“玉糁羹”将主食与甜品融为一体,且有牛乳醇香,正与如今的清补凉有几分神似,只是不知道苏过发明“玉糁羹”的时节是否为夏季,若是夏季将其放凉饮用,也必是解暑的佳品。

北宋的汴京城,本就是名物荟萃之处,一时间不仅酒旗招摇,还有不少冷饮店,当时谓之“从食”,其主打产品有类似冰糕的“冰雪”、类似米酒的“凉浆”、类似凉粉的“荔枝膏”,至于“甘草汤”“药木瓜”等类似今天凉茶的冷饮更是数不胜数。作为宋朝第一吃货的苏东坡对这些自然是如数家珍,至于“玉糁羹”,只要苏过能发明,苏东坡就敢把它折腾成冷饮,也许它与清补凉还真的有些渊源呢。



## 董源《潇湘图》卷

《潇湘图》卷,五代·南唐,董源作,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141.4厘米。

本幅无作者款印,明朝董其昌得此图后视为至宝,并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名为董源《潇湘图》,后入清宫内府收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潇湘”或指湖南省境内的潇河与湘江,二水汇入洞庭湖,“潇湘”也泛指江南河湖密布的地区。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大片的水面中沙洲苇渚漫延无尽。画面中以水墨间杂淡色,山峦多运用点子皴法,几乎不见线条,以墨点表现远山的植被,塑造出模糊而富有质感的山型轮廓。墨点的疏密浓淡,表现了山石的起伏凹凸。画家在作水墨渲染时留出些许空白,营造出云雾蒙蒙之感,山林深蔚,烟水微茫。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点缀其间,赋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阶段,形成了不同风格,后人概括为“北派”与“南派”两支。董源此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董源(?—962年),五代时南唐画家,源一作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南唐中主时任北苑使。《宣和画谱》中记载董源作品甚多,但传世寥寥。传董源山水有“水墨”和“青绿”两类,今仅见“水墨”一路,多作江南一带山水景色,幽旷平和,得山水之神气,意趣天真,品格高古,开创江南画派特有风格。后世巨然继承董源衣钵,与之并称“董巨”。其藏品经明代董其昌、袁枢收藏者多。

董其昌  
读史侧翼

## 钱穆的“引路人”

■ 姚秦川

33岁以前,钱穆一直辗转于家乡的几所中小学任教,这对于志向远大的钱穆来说,算不上“事业有成”。再加上当时家庭突遭一系变故,钱穆心中的伤痛也许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能够感受得到。

钱穆的人生转机出现在1929年。这一年,他结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顾颉刚。在顾颉刚的大力帮助和提携下,再加上钱穆自己的努力,他最终华丽转身,由之前的中学讲台,一跃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

1929年4月,在北大任教的顾颉刚来苏州讲学。当时,钱穆也在被邀请之列。在宴席上,他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却已经成为北大助教的顾颉刚,当时的他顿生仰慕之情,两人也相谈甚欢。宴席结束后,钱穆将自己刚刚写好的《先秦诸子系》的手稿交予顾颉刚过目,希望他能给出指导性意见。

顾颉刚当场翻阅了几页后,对钱穆的文学功底和精湛学识大为震惊,在聊天的过程中,当他得知钱穆现在只是在一所中学教授国文时,连连感叹他不应将自己的才华埋没于此,“而应去大学教授历史”。对于顾颉刚的褒奖,钱穆内心虽然高兴,但他却觉得自己能力有

限,对于高不可攀的大学讲台,他也从来没有想过。

到了当年冬天,钱穆意外地收到了顾颉刚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顾颉刚邀请钱穆为他主编的《燕京学报》撰写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收到信后,认真梳理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并直击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谁也没有料到,钱穆的这篇短文刊发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撬动了教育界思潮传授的整个体系。彼时,北平高校大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钱穆的文章发表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也为之停课。

钱穆的文章引起的轰动也令顾颉刚兴奋不已,他同时也兑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向北大推荐了这名“优秀的人才”,钱穆顺利地正式成为北大历史副教授。在北大这所“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的高校中,钱穆也将自己的半生所学传递出去,最终也成就了他最辉煌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很多场合,钱穆总是心怀感恩地表示,顾先生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没有他的帮助,自己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番平淡的景象。

王国维  
读史侧翼

## 王国维抄书

■ 江舟

王国维先生是近代难得一见的勤奋刻苦的读书人,他曾经说过:“余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难舍去者,亦惟此耳!”王国维先生一生勤于读书,写书,其实,抄书也是王国维读书做研究的一条重要方法。

王国维请人抄书,自己也亲自抄书。他曾经在给马衡的信中就提道:“敦煌出土唐写本《切韵》原影本一时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副本”为了留下重要的历史书籍资料,他整整二十天不舍昼夜将此书抄录完成。王国维这种抄书方法,不同于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抄书。顾炎武读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最主要的办法,是“自督读书”。顾炎武给自己规定每天应该阅读的卷数,进而将读过的书认真抄写一遍。例如,他读完《资治通鉴》,就抄写出了一本《资治通鉴》。顾炎武抄书,是为了帮助记忆,正是这样的苦功,所以顾炎武即便到了晚年,《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均可熟练背诵。王国维为近代学者,他抄书的主要目的,虽然有通过抄书加强记忆

的效果,但更为重要的是设法保留稀有珍贵之书,以便今后查阅或者刊印,如敦煌石窟所出的罕见文书;其次是为音韵学的研究搜集不可缺少的资料,为音韵学的历

史研究寻求证据和方法。因此,王国维在研读音韵学书籍时,抄书非常勤奋。

1917年7月2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说:“今日已尽将《和名类聚》中所引唐人韵书抄出,中有陆词《切韵》五十余条,郭知堂《切韵》五条,薛晋《切韵》二条,王仁煦《切韵》一条,祝尚邱《切韵》三条,裴务齐《切韵》三条,孙编《切韵》二十一条,《唐韵》三百七十一条。此皆《唐韵》所本。而所引《唐韵》尤与《广韵》相合,知《广韵》实合诸切韵而成。”王国维先生抄书,也并非简单劳作,他已在抄录书籍的过程中博闻强记,吃透了书本精神,书籍抄录完毕,也将书籍精读研究了一遍。

王国维通过抄书,一方面保存和抢救了一批珍贵古籍,另一方面加深了对书籍的认识和理解。学人已去,但是王国维先生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和坚韧毅力,却像明灯一样,照亮后辈学人的读书治学之路。

## 《红星照耀中国》的永恒魅力

■ 丁晓平

一本书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因其增加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铭记。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1928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上海。在中国,他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1936年6月,斯诺和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起冲破重重封锁,以“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的勇气,经西安抵达陕北,冒着炮火硝烟进入陕北苏区,成为第一个到“红色中国”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带着这些疑团,斯诺来到陕北苏区。

7月初,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他拟定了一份为期92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7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保安县(今志丹县)会见斯诺。随后,斯诺前往陕北苏区红军前线部队采访,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众多红军将领和普通士兵、农民。10月初,斯诺回到保安,随后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10多天的谈话。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盔甲胡同13号的家中,结束了历时近4个月的“教育兼阅历,入学兼旅游”的采访,开始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他在陕北苏区的所见所闻,不偏不倚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将领、士兵、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战斗、学习和生活。《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内容是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即《毛泽东自传》)和第五篇《长征》。这份毛泽东同志唯一亲自修改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自然亲切,又撼人心魄。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对于长征,斯诺认为:“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红军严明的纪律给斯诺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回忆,他花了相当篇幅记录护卫他的“红军旅伴”的精彩故事:“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4个月的采访,斯诺懂得了红军的优越性在于统帅部完全有能力训练麾下的人才,锻造其政治信念、军事纪律和制胜意志,“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而且红军“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效仿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在预旺县红军前线,斯诺聆听了一堂红军的“政治课”,并对在场62名红军战士的成长作了分析。“红小鬼”的精神面貌和战斗精神令斯诺极为钦佩,他充满感慨地写道:“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

在“红色中国”的日日夜夜,斯诺大开眼界,彻底改变了他在“国统区”对中国的认知,消除了心中的疑惑。他诚恳地写道:“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序言中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中国》不同中文译本出版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奔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中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战争开始以后,我每走到一处地方,哪怕是最偏僻的地方,总有那帮夹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问我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1944年,他在《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序言中自豪地说:“就我所知,写有关中国情况的外文书而对当前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据《人民日报》,有删节)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